

首都师范大学秋韵文库



为了史学的繁荣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首都师范大学秋韵文库



SHOUDU SHIFAN DAXUE QIUYUN WENKU

为了史学的繁荣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

WEILE SHIXUE DE FANRONG

邹兆辰◎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邹兆辰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656-0632-8

I. ①为… II. ①邹… III. ①史学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5761 号

WEILE SHIXUE DE FANRONG

为了史学的繁荣

——对话当代历史学家

邹兆辰 著

责任编辑：丁晓山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78 千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邹老师辛勤工作十余年的这份成果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首先应该表示祝贺！

早在 20 世纪末年，邹老师与江涓、邓京力两位年轻教师一起进行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课题的研究，他们不仅从书籍、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关于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思潮的梳理，并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时他们还走访了很多活跃于当时中国史坛的学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和中年学者，也包括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在同史学各个领域的学者的交流中思考当今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与趋势，捕捉具有前瞻性的史学新潮，预测新世纪史学发展的未来。他们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他们所合著的《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一书，这本书于 2001 年出版，并获得了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它对于了解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进行学者访谈的过程中邹老师发现，直接与当代史学工作者对话，是一个研究当代史学学术发展史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者访谈，不仅可以了解史学发展的一般趋势，而且可以结合个案更好地看到这种趋势如何在学者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这就需要探讨每位学者个人成长的学术背景，包括师承关系、治学取向、研究路径、学术成就以及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切感受。通过这些访谈，不仅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更可以看到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学术追求与精神境界。于是，邹老师在课题结束以后，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他所做的工作，有的是反映受访学者对于当前史学发展中的备受关切的问题所进行的建设性的思考，多数是对于受访者个人一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的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的访谈，不仅反映了他们治学的历程，更反映了他们在整个社会变革中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因此，他把他的第一本访谈录定名为《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相信这些

内容对于年轻一代的学人或者是准备进入史学园地的大学生也是深有启迪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邹老师所访谈的学者有些正是今天在史学各个领域中年富力强的领军人物，他们进入史坛正逢其时，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的保证下，他们适时地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成为推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骨干力量，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史学的希望。他们的奋斗历程也可以成为激励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奋勇跟进的精神力量。因此，邹老师把他的第二本访谈录定名为《为了史学的繁荣》。

从史学的整体角度讲，这本书所反映的学者面仅仅是邹老师所能够接触到的史学家的情况，对于整个史学领域来说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他不可能对史学领域中那些学术大家或史坛新秀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反映，但是这不能降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在新中国的雨露阳光下为中国的史学发展进行艰苦努力的一代学人所做的开创性的劳动成果，也记录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新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史学所做的新的开创性贡献。60 年来，两代学人的携手努力，共同开创和发展了新中国史学，记录下这些学人的艰苦奋斗历程，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使命。邹老师正是不失时机地把这两代学人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所做的贡献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有些访谈资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当年访问的一些学者今天已经成为耄耋老人，有的甚至已经作古，长期以来除了史学圈内的人士之外，他们并不为社会一般公众所了解。因此，这部访谈也可以说为普通的史学工作者树碑立传，我们不能不说这项工作对于读者了解 60 年来在中国史坛上奋力拼搏的学人们的人生追求和学术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用口述史的方法反映 60 年来中国史学的学术发展，也是一种新的方法，也是国际上流行的方法。西方很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口述史学，特别是在社会史和下层民众的研究中取得很多成果。口述史学的形式与传统的以文献为主的史学研究方式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使历史更富有人文关怀的特点和生动形象的内容。当然，这部学者访谈与一般的口述史也有很大的区别。被访的人物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具有很深学术造诣

的学者，访谈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甚至要参考他们已发表的学术论著来充实对话的内容。但是，由于借鉴了口述史学的形式，就使这部访谈具有了叙事性和人文性的特点，这样就可以使读者与他们可能感到很陌生的历史学家的距离大大缩短。历史学家一贯的职责是研究历史、研究他人，而今天历史学家自己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的确，历史学家要了解人、研究人，同时我们也期望广大读者了解以历史研究为终身追求的那些史学工作者。我想，这种专业人士与广大读者的互动，对于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

刘新成
2009年12月

目
录

序	(1)
良史工文，十年磨剑——访田居俭研究员	(2)
坎坷的人生与执著的追求——访庞卓恒教授	(25)
我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访刘志琴研究员	(49)
深入非洲，研究非洲历史和现实——访陆庭恩教授	(67)
世界现代史研究的新拓展——访张宏毅教授	(81)
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访叶显恩研究员	(97)
把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访瞿林东教授	(108)
多做一些垦荒者的工作！——访张广智教授	(125)
努力探索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访陈其泰教授	(141)
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建立新的框架——访冯天瑜教授	(158)
改革开放与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访王晓秋教授	(171)
我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访陈祖武研究员	(182)
对先秦历史文化问题的艰辛探索——访晁福林教授	(200)
借鉴国外成果，为深化史学理论研究服务——访于沛研究员	(215)
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艰难回溯——访沈长云教授	(231)
居英十一年，倾力探讨中西文化异同——访何平教授	(248)

MU
LU

从英国史研究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访钱乘旦教授	(265)
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访刘新成教授	(279)
我的敦煌学研究——访郝春文教授	(296)
社会文化史框架内的中国近代陋俗文化研究——访梁景和教授 ..	(317)
走向新史学：理论与实证的交错上升——访赵世瑜教授	(336)
附录：	
探索当代中国史学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访邹兆辰教授 曹守亮 曹小文	(356)
后 记	(375)



田居俭，1935年1月生，吉林双辽人。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76年1月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兼《历史研究》主编。1992年调当代中国研究所，任第一研究室主任兼《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2004年退休。现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和历史人物。主要著作有《李后主新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李煜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李煜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春泥集》、《乱世风云——五代十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主编)。

良史工文，十年磨剑

——访田居俭研究员

学者印象

笔者同田居俭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相识了。那时他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任副主编，后来又任主编。不过那时交流较少。当我们能够深入地交流时，他已经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那时正值世纪之交，他谈了自己的治学经历，更多的是谈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看法。2007 年 8 月，在他的新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一次新的谈话。他将他的史学论文选集——《春泥集》和专著《李煜传》的最新修订本送给了我。他说，他一生在史学研究上花费的心血都凝聚在这两部书中。通过谈话和阅读他有关论著，对他的史学思想和实践有了新的认识。他最初是跟着金景芳先生学习先秦史的。金先生强调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学历史必须把握这个“源”。如今，田先生已经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了。这表明他的史学研究也从“源”到“流”，从上古延续到当代了。田先生文史兼工，他最珍爱他十年磨一剑的成果《李煜传》。这本书的写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十多年来，他精雕细刻，不断修改，不断丰富，至今已经出到第三版，成了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史学佳作。目前，图书市场可以说琳琅满目，但是像这样内容丰富、雅俗共赏的佳作并不多。这本书是当今的史学界在“良史工文”方面的一个活生生的范例。我们这次的谈话，就这本书的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问：田先生，我们这是第二次交谈了。上一次访谈是在 1999 年，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发展趋势。这次访谈希望您能把您治史的最主要特点作些梳理。

田：好，欢迎你！老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在太原举行中国封建经济特点和发展道路的研讨会上。那时我们还是中青年，一转眼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说到我治史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哲史文兼涉，学思写并举”。这是我多年遵循的学术信条。

问：的确如此。我发现您的这个追求一直没变。上次我来时，您的《李煜传》刚刚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第二版，今天又看到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最新修订版。第三版以后，您是不是还要继续修改啊？

田：还要继续修改。这本书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啊。最早是1987～1988年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知识》上以《绝代才人，薄命君王》为总题连续刊载。1991年吉林文史出版社作为“中国历史人物丛书”出版，书名《李后主新传》。199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按照传记类图书以传主常用名整齐划一书名的成规出版修订本，将书名改为《李煜传》。出版以后，市场脱销，1998年又重印一次。现在修改、补充，出了第三版。第三版以后我还要修改，还要推出新的版本，到2012年新版本就将问世。

问：这就是您一生持续不断的追求啊！我想，《李煜传》的成书过程可以和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相媲美了，他那本书也修改了多次。我建议我们关于《李煜传》的谈话暂时停下，先回到您最初走进史学门槛的时光。

一、从高校历史教师到《历史研究》主编

问：在我访谈的学者中，东北籍的还不多。您是在东北出生的吧？

田：对，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935年1月，我出生在吉林省双辽县白市村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不知是什么人、根据什么经典，给我起了一个对人生颇有警示意义的名字。我从懂事起，就很喜欢这个不容易跟别人重复的名字。

我出生之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白山黑水之时。我自幼背井离乡，跟随父辈漂泊他乡，1949年回到双辽。1950年，我开始就读双辽中

学。中学时代，求知欲望非常强烈的我，在全神贯注地接受老师的授业解惑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校图书馆的几乎所有藏书，为后来深造文史奠定了初步基础。1955年，我作为双辽中学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考入了东北当时唯一的综合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59年毕业后留系任教，跟着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学习。一边听他给学生讲课，一边系统地熟悉先秦的群经诸子和有关史籍。他讲“先秦思想史”、“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我作为他的学术助手，给学生辅导答疑。金先生常和我讲：先秦史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不论你日后研究哪一段，不懂先秦史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他常用朱熹的诗《读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来启发、教导我攻读先秦史，置身中国学术的“源头活水”，为以后从事历史研究夯实基础。

正当我的教学科研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写作，我便集中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同为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这一时期对经典著作的研读，可以说为我日后继续研究历史磨砺了理论武器。

问：1959年以后，您一直在吉林大学工作，是什么原因使您来到北京呢？

田：可以说是偶然的一个机遇吧！197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管的《历史研究》杂志复刊，从一些高校历史系借调一批教师参与编辑工作，我是其中的一员。1976年，正式调入。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历史研究》并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我从编辑室副主任的岗位先后走上《历史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兼《历史研究》主编的岗位。由于审稿、选稿和编稿的需要，特别是防止工作中出现遗珠之憾，逼迫自己努力扩大知识面，不仅要熟悉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还要熟悉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近代史。

1992年，我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从事我亲历和热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进入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便意味着研究时段要往后延伸，即要熟悉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的中国当代史。

二、化作春泥更护花

问：您似乎对龚自珍的《乙亥杂诗》情有独钟，特别喜欢“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两句。您的书斋命名为“春泥斋”，您自命为“春泥斋主”，您的论史文存也命名为《春泥集》，可见您对于“春泥”有特殊感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这一生是把您所珍爱的历史科学视为鲜花，而把自己视为春泥，以春泥护花的精神来善待历史科学？

田：你所说的和我所想的大体是一致的。不过你的思路比我开阔，对我很有启发。我在《春泥集》的自序里说：我是酷爱历史教学和历史编辑的生涯的。在以往的大半生中，当过15年“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教师，还当过20年“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这两种职业实际上都是为国培育英才。时代赋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我和青年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我常常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而自豪，甚至想过倘若生命可以从头再来，我还要继续这种无怨无悔的选择。所以，我长期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自勉，寓意是即使将来变成“落红”，也要化作“春泥”来“护花”。

问：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对于“将来”和“落红”，可不可以做更为宽泛的理解呢？我认为每一个史学工作者，不论中青年还是老年，在职还是退休，健在还是作古，都是“落红”，都是“春泥”，而这个“花”，就是我们共同珍爱的历史学。从《春泥集》中可以看出，您曾经对公众大声疾呼，要重视历史，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重视学习历史。这不就是一种“护花”的行动吗？

田：你对“将来”和“落红”当然可以这样理解。我在这方面也试着做了一点工作。1999年2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学史》一文；2002年3月，我在《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再论学史》一文。这两篇文章《新华文摘》都转载了，《论学史》一文还获得了1999年的“五个一工程奖”。此外，还有《治史与治国》、《龚自珍的名言与日寇的“灭国去史”》、《必须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等文章。我写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就是呼吁各级领导干部把“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历史列为执政为民的必修课。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地读一点历史”。并一再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些党员和干部放松了自己的学习、修养和改造，头脑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少了，个人主义的东西多了，受腐朽思想的影响多了。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要自觉地学习历史，以人为镜，以事为镜，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保持清正廉洁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强调一个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我在文章里，也建言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中国的一条古训：“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意思是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都要以史为鉴。古代先哲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治国主张，就是因为他们从朝代更迭中认识到前车之覆，后车当鉴。我在《论学史》中，不仅论述了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的理由，而且还向他们提出了如何学习历史的建议。这篇文章《光明日报》加按语在第一版转第二版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早间新闻节目里播发了消息。三年以后，《光明日报》又约我撰写《再论学史》并加按语在同样版面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学习历史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利于丰富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有利于加强公民思想道德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深入论述了学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增长历史智慧的重要性。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结合工作实际，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问：这些年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我觉得您做“春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学的指导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中的主流地位。我看您对郭沫若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是明证。

田：是的。我对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是充分肯定的，为此下了一番工夫进行研究。我除了写有《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等文章外，还专门写了《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奴隶制时代〉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重温〈甲申三百年

祭》》等文章。

问：您把郭沫若在史学中的地位与意大利诗人但丁相比，对我很有启发。恩格斯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您则说，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对郭沫若当做如是观。

田：事实就是这样。郭沫若经历了旧中国的死亡，更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是中国旧史学的批判继承者，更是中国新史学的缔造弘扬者。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开端，是以郭沫若这位史学大师为标志的。这是15年前我在《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讲的。现在我还是这样看。

我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确实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我论证的重点是，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其创造性的成就，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一点在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何干之说：郭沫若是一个有天才的史家，他的历史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划时代的贡献。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一个新纪元。我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然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设计的崭新格局和开创的科学章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了作品本身。我还提出，郭沫若不仅因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发凡起例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河，被公认为近代史学除旧布新的一代宗师；而且还因为其有一批独领风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力著，而被时人和后人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

问：您在研究郭沫若在中国史学的地位时，不仅花大气力论证了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泰斗，而且花大气力论证了他是“造就队伍的一面旗帜”。

田：不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郭沫若的倡导和影响下，吕振羽是最早追随郭沫若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人之一。吕振羽指出，在当时史学斗争的过程中，郭沫若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的，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范文澜也是继郭沫若之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家之一。他在1940年写文章指出，郭沫若是世界著名的考证家和历

史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我想，范文澜所说的“甚大”影响，当包括他自己在内。

侯外庐在《初的追求》中说，他是在社会史论战的高潮中，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1930年他从国外回来看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中国的历史几千年，而几千年来的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但是从来还没有有一本书能像郭沫若的书这样对中国古史作出难能可贵的解释来。这本书虽然有一些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但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开辟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前途”。从30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看做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老师。

我在文章中指出，到20世纪的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中国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这个群体的周围还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新中国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 and 绝对优势，当年那些受郭沫若熏陶而走上了史学道路的青年，已经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了。所以，我认为史学工作者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要学习郭沫若，是因为他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研究历史的正确方向和首创精神，已经成为造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一面旗帜。白寿彝说得好：史学界的同志们，无论是否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沫若开辟的道路，随着郭沫若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

问：我觉得您作为“春泥”护花的第三个表现，是在主编《历史研究》期间，大力倡导历史学的新学科、新领域、新视角，努力促进历史学的繁荣。

田：我主要是在为复兴和加强社会史研究方面尽了一点绵薄之力。1986年，史学界召开了新时期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历史研究》是发起单位之一。1987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刊发一组社会史研究的文章，我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撰文推荐。文章的题目，是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人民日报》和《新华文摘》相继加以转载，在史学界和理论界产生了积极反响。我在文章中引用马克思的话：“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深入”，也应该

包括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可以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着手，开拓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再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

1989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谈《深入开展社会史研究之我见》，主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跨学科研究，以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问题。这一时期，我还撰文呼吁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提出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党的活动为核心来研究党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要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为背景来研究整个社会。前者是党史，后者是社会史。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1997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这是到那时为止国内问世的第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的中国社会通史。我为这部书的出版写了推荐文章。

问：1992年您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又不断呼吁重视当代中国史研究，并直接参与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这也可以说是“护花”的一种表现吧！

田：作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自觉地研究当代中国史，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我是主动适应形势的需要的。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悠久历史中划时代的崭新篇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最有光彩的阶段，所以它理所当然是一个亟须开拓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值得史学工作者用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1994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我作为这个杂志的首任主编撰写了《发刊辞》。我在发刊辞中强调，研究当代中国史，不仅是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建树。我觉得从当时的形势看，建立一个以国史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条件已经成熟。当代中国史可以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学科，在学术领域内大展宏图。我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当代人要治当代史》的文章，提出治当代史的人要聚精会神地研究当代史，不治当代史的当代人也要关注当代史的研究。博古才能通今，通今更能博古，两者优势互补，缺一不可。